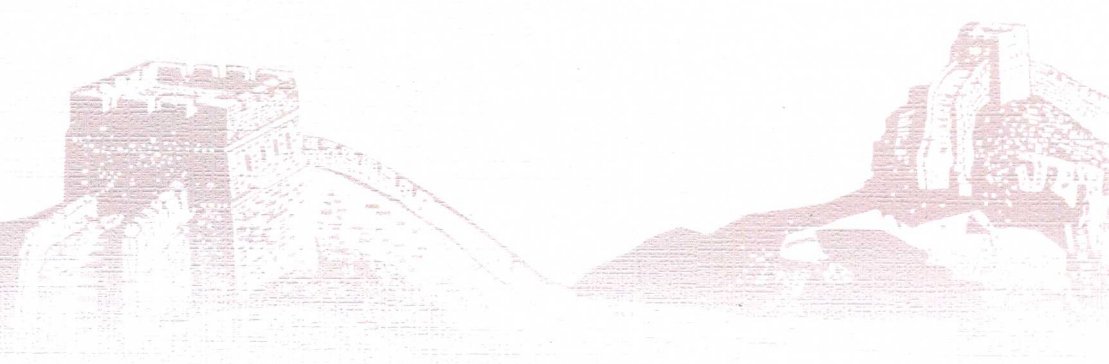


生态社会主义与 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构建



徐艳梅 于国丽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生态社会主义与 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构建

徐艳梅 于国丽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态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构建/徐艳梅, 于国丽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 - 7 - 5161 - 8628 - 2

I. ①生… II. ①徐… ②于… III. ①生态社会主义—研究 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IV. ①D091.6 ②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012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特约编辑 林 木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
插 页 2
字 数 258 千字
定 价 6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一般项目 (08JDC117)
聊城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目 录

第一章 生态社会主义概论	1
第一节 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历史背景	1
一 全球资本主义与生态环境恶化	1
二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困境	8
三 西方生态运动与绿色政治的兴起	11
第二节 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	15
一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思想	15
二 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	21
三 生态学、系统论的方法论	26
第三节 生态社会主义概念及历史发展	30
一 生态社会主义概念	30
二 生态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	31
第二章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述要	36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与自然	36
一 詹姆斯·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重构	36
二 约翰·福斯特：马克思的自然唯物主义 及其生态含义	42
三 乔纳森·休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辩护	51
第二节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批判	61
一 高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与生态危机	61
二 福斯特：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环境	67
三 奥康纳：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与两种危机	71

四	岩佐茂：资本的逻辑与生活的逻辑·····	83
五	生态社会主义者对生态资本主义的批判·····	91
第三节	生态社会主义构想·····	101
一	早期生态社会主义者的设计·····	101
二	高兹：生态理性与劳动的解放·····	106
三	完全共同体——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设想·····	109
第三章	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一个对照·····	127
第一节	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对照·····	127
一	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联系·····	127
二	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	137
第二节	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对照·····	148
一	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实践及其意义 ——以苏联为例·····	148
二	生态社会主义实践及其意义 ——以德国绿党为例·····	173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构建·····	193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意蕴·····	193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经济观·····	193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政治观·····	198
三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伦理观·····	201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构建·····	205
一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探索·····	205
二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及其生态思想·····	228
三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其价值取向·····	241
四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环境治理·····	251
参考文献	·····	260
后 记	·····	267

第一章 生态社会主义概论

第一节 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历史背景

一 全球资本主义与生态环境恶化

(一)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转换

20 世纪 60 年代, 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全球化资本主义阶段。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是时空的重组, 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跨地区传播, 另一方面是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性影响。

生态社会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把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归结为三点: 第一, 三种“古典管理模式”的瓦解, 即西方国家的阶级和解、社会民主以及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制度的削弱; 东方国家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变革; 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和那些半自给自足式的民族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管理模式的瓦解和消亡。第二, 资本以及作为资本政治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的传播, 以及各种类型的环境—生态和社会政治问题的增加。第三, 新社会运动(如女权、种族、生态等)兴起, 工人运动向生活领域的扩展。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正是在此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①

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描述, 安东尼·吉登斯的理论最为深刻。他指出, 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是: 全球抽象社会生活模式形成, 民

^① [美]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唐正东、臧佩洪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515 页。

族国家边界日益模糊。在安东尼·吉登斯看来，全球化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时空的重组，即随着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全球性抽象社会生活模式的逐渐构成，某一地区的社会生活已经成为影响另一地区社会生活的因素，民族国家内部具体的社会生活将不再完全依赖熟稔的人际关系，而依赖一种全球网络。当具体的社会生活超出民族国家限制而影响另一民族国家社会生活时，前一种生活就“脱域”于民族国家的边界，并在影响另一种生活时“再嵌入”^①，时空的统一性对日常生活便不再具有特殊意义。

从实践来看，民族国家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正在超越边界。

第一，自由贸易区和共同市场等经济一体化形式使经济生活脱离边界限制。经济一体化内部的零关税趋势和国民待遇原则使民族国家经济早已在无边界的世界上自由流动。

第二，全球社会的成长。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丰裕的越界行动和人际关系的全球拓展，使有别于民族国家内部生活的社会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而全球人际关系的拓展，又使得共同的观念在无数互动中滋生。比如现代性——民主和科学——在全球的开拓已经使全球各国人民有了共同话语，对于现代性的认同形成了一种超越传统和地域的共同精神气质。简言之，全球化开拓了新的超越边界的人际关系，由此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塑造并不断强化了人们的共同观念。在此基础上，新的规范、安排和机制应运而生，全球社会在这些共同观念和共同的安排及规范中促进了国际关系的新发展。这样的全球社会早已不是民族国家现代性规划所能控制的，它超出规划的范围，不断腐蚀规划赖以形成和发挥作用的边界。

第三，民族国家政治生活也显现出全球特征。首先，全球问题的增长要求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当代全球问题关涉人类的前途，它影响人类的生存安全（如疾病的传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等）和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如生态与环境危机、难民潮、气候

^①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永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变迁等)。在威胁和挑战人类前途的全球问题面前,没有任何民族国家可以逃脱自己的责任,全球治理需要各民族国家以多边主义或相互协调方式合作,在合作过程中,民族国家将转让自己的部分权力给国际组织,或将共同达成的条约与协议转化为国内立法条款,以促进治理目标的实现。其次,国内事务与全球事务的一体化使国内政治过程受国际社会的影响与支配。国内政治只有适应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的国内经济和其他社会事务的要求才能使自己运转下去。最后,国内政治忠诚的部分转移。现代公民在全球化时代的忠诚对象不仅只限于民族国家,他们将政治忠诚投向边界之外的国际社会(如环保主义者和国际人道主义者)。这一转移源于个体反思性的形成。反思性能力塑造了新的自我批判主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价值和信仰的自我重建。^①

从意识形态方面看,全球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正在经历重大变化,出现了所谓的“文化唯物主义”,文化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似乎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唯物主义似乎正在变成文化唯物主义。此外,意识形态的分化和整合趋势也日益明显。强调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多元主义已经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主导性政治意识形态,而其他各种各样的极右和极“左”意识形态的影响却并没有明显减弱迹象,一些极右思潮如新法西斯主义反而在不断增大。所以,西方左翼学者在提出“文化唯物主义”分析的同时,也倡导“多元文化主义”或“文化多元主义”。

在上述时代背景下,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民族国家此起彼伏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危机,新社会运动应运而生。新社会运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西方60年代中后期以来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现象,它包括西方70年代以来发生的和平运动、学生运动、反核运动、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性恋权利、妇女权利、动物权利、选择医疗、原教旨主义宗教运动、新生代运动、生态运动,等等。一般来说,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第三世界

^① 参见[英]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

反经济帝国主义斗争、反种族主义运动构成新社会运动的五种最基本的运动形态。其中，生态运动和女权运动是最成熟、最主要的两种形式。新社会运动与传统的工人运动不同，它在广义上指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反抗资本主义的一切形式的斗争，狭义上主要指生态运动等近30年来新出现的社会运动形式。新社会运动内容复杂，但总体特征是对西方工业化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如人性异化、环境破坏、性别压抑等问题的批判。这场影响巨大的社会群众运动脱离了阶级集团、利益集团和政党意志范畴，在活动上不再依赖国家、政党或军队这类组织的原则，因而也不再是权力导向的而是文化导向的运动。它的目标是对一元化工业主义观念包括价值原则、思维模式、话语体系以及行为、习惯、等级秩序等的解构。无论是新社会运动，还是绿色运动都旨在维护生活世界，反对工具理性的侵蚀。新社会运动暴露和凸显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新产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用不同概念来表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如“后竞争资本主义”或“后市场社会”（阿多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哈贝马斯）、“发达工业社会”（马尔库塞）、“有机资本主义”（列斐伏尔），等等。这些概念的含义不尽相同，有时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资本主义，有时则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当代资本主义。但在他们眼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都出现了这样一些新变化及新特征：科学技术成为主要的生产力和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所有制关系已经改变；国家职能及政治、行政结构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危机形式及重点已转移；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再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统治的权力正逐步由资本家转向技术专家，统治方式从经济剥削和人身摧残转向思想意识方面的奴役；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取代等价交换的意识形态而变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辩护工具，如此等等。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使洛克、马克思和韦伯等人的传统叙事结构遭到挑战。60年代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着力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的危机问题，如哈贝马斯、米利班德主要讨论合法化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者莱斯、阿格尔等人则主要讨论生态危机。在危机理论基础上，他们讨论了当代

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二）全球生态环境恶化

伴随全球化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贸易和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越来越突出。

20 世纪 30 年代起，环境公害事件在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如 1930 年 12 月在比利时发生了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3 年 5—10 月在美国洛杉矶发生了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 年 10 月在美国发生了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 年 10 月在英国发生了伦敦烟雾事件，1953 年在日本九州南部熊本县发生了水俣事件，1955—1972 年 3 月在日本富山县发生了骨痛病事件，1961 年在日本四国发生了哮喘病事件，1968 年在日本九州爱知县等 23 个县府发生了米糠油事件，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环境公害事件把更多公众置于危险的生态环境中，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与此同时，伴随着工业化迅速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广到世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人口迅猛增长，人类消费不断增加，环境问题从区域性环境污染扩展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根据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和世界资源研究所发表的《1987 年世界资源》报告，全球生态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土地资源逐年衰竭。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工业排放物的增加，严重地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目前，全世界每年损失耕地 2100 万公顷，每分钟损失 40 公顷；每年土地沙漠化 600 万公顷，每分钟有 10 公顷土地沙漠化。按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全球土壤退化评价分类标准，在过去几十年间，全球大约有 12 亿公顷有植被覆盖的土地发生了中等程度以上的土壤退化，相当于中国和印度国土面积的总和，其中 3 亿公顷土地发生了严重退化，其固有的生物功能丧失。

（2）森林植被遭到毁灭。根据世界观察研究部门的研究报告，地球上森林的总面积已从 1 万年前的 62 亿公顷减少到现在的 28 亿公顷。目前世界上平均每年有 1800 万公顷的森林消失，即每分钟消失森林 30 公顷。如果听任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170 年以后，全世界森林将毁灭殆尽。

（3）水资源日趋紧张。20 世纪以来，随着人口增长和工农业生

产规模的迅速扩大,全球淡水用量急剧增加。1900—1975年,世界农业用水量增加了7倍,工业用水量增加了20倍。并且近几十年来,用水量正以每年4%—8%的速度持续增加,淡水供需矛盾日益突出。1977年联合国警告全世界:水不久将成为一项严重的社会危机,石油危机之后的下一个危机是水。目前,世界上有60%的地区面临淡水不足的困境,40多个国家的水资源严重匮乏。另外,每年又有成千上万吨的废油、污水、有毒废物被排入江海湖泊。现在全世界每年排放污水约4260亿吨,造成55000亿立方米的水体受到污染,约占全球径流量14%以上。据联合国调查统计,全球河流的稳定流量的40%左右已被污染,不仅使渔业资源直接受到危害,而且使全世界约有18亿人不得不饮用被污染的水,每年有30%的人因此患上各种疾病。

(4) 大气污染日趋严重。目前,全世界的工厂和电厂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达到50多亿吨。据科学家预计,在21世纪的前50年内,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将比现在增加一倍。此外,二氧化硫、氧化氮、氯化氟、甲烷等有害气体向大气中的排放也在迅速增加。这些污染物在大气中形成酸雨,导致土壤变酸,森林、农作物死亡,严重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同时,二氧化碳等气体在大气中含量的增加还会使地球温度上升,造成“温室效应”。联合国《1996—1997年度世界资源报告》预测,到2020年,全球能源消耗将增加50%—100%,由此造成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增加45%—90%。据估计,在未来100年中,全球气温可能再升高1—3.5℃。地球变暖将使海平面不断上升。另外,空气中氯化氟含量的增加使大气层上方的臭氧层出现巨大的“空洞”。科学家们发现,南极上空的臭氧自1979年以来一直在加速减少。臭氧减少将会使更多紫外线照射地球表面,使地球生物遭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尤其是使皮肤病和眼疾患者急剧增加。

(5) 物种数量迅速减少。物种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盛衰不仅是衡量生态状况的重要标志,而且它本身是人类潜在的生存资源。一个物种一旦灭绝对人类将是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物种的消亡恶化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反过来环境的恶化也加速了物种灭绝。在过去25000万年中,重要的物种灭绝事件大约每隔2600万年

发生1次。然而,工业革命以来的近200年,伴随着人口数量膨胀和经济快速发展,野生动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减少。科学家估计,由于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近代物种的丧失速度比自然灭绝速度快1000倍,比形成速度快100万倍,物种的丧失速度由大致每天1个物种加快到每小时1个物种。据世界《红皮书》统计,20世纪有110个种和亚种的哺乳动物和139个种和亚种的鸟类在地球上消失了。目前,世界上已有593种鸟、400多种兽、209种两栖爬行动物以及2万多种高等植物濒于灭绝。此外,新加坡科学家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还发现,主要濒危物种在消亡时还会连带相关的其他物种共同灭绝。据估计,目前濒危物种中的主要物种一旦灭绝,将有6000多种昆虫、螨类、真菌及其他有机生物一起消失。更令人担忧的是,科学家们对这些物种的研究只不过了解一些皮毛,地球上估计共生存着1400万个物种,只有175万种被记录在案。许多种生物甚至在被人类发现之前就灭绝了。除上述种种令人忧虑的事实与可能性之外,人类还受到噪声污染、电磁波污染、热污染、核污染、生物污染等污染的威胁。

令人震惊的环境事件和数字都使人们认识到一个严峻事实:生态环境已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已处于严重的生态危机之中。面对着已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人类不得不思考:如果生态环境继续恶化,自己是否真的能独善其身?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农药污染对自然环境中一切生命,包括人类在内的严重危害,犹如一声春雷唤醒了世人的环境意识。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全球性的环境大会——“人类环境大会”,将全球环境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在这次会议上,巴巴拉·沃德的非官方报告——《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强调了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的高度重要性,对建立地球上的新秩序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同年“罗马俱乐部”在它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提出了著名的“人类困境”:人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必然导致极限。“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继续不

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一百年内某一个时候达到极限。”^① 它强调把环境保护放在比人类权益更优先的位置上考虑的重要性。此后,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环境保护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在环境公害与日益增强的环境意识面前,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反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提出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替代制度方案——生态社会主义。

二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困境

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积累会导致工人的相对贫困和失业,最终产生自己的掘墓人——工人阶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把产业工人作为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但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矛盾中的继续生存的能力。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能继续生存有两个原因:第一,工人阶级已丧失了阶级意识。欧洲工人阶级并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牢记自己的革命使命,它缺乏足够的阶级意识和理论的、政治的方向(卢卡奇在1923年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的观点)。第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足以保证向工人阶级也提供在此前只为资本主义上层人物提供的商品。这是在假定工人阶级的人数和劳动时间较马克思时代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的前提下说的。工人阶级的变化无疑使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陷入困境。

生态社会主义者高兹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一书中描述了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产生的新变化:1961—1988年,产业工人阶级的人数在英国减少了44%,在法国减少了30%,在瑞士减少了24%,在西德减少了18%。在这20多年的时间中,欧洲的一些国家约有1/3甚至一半的工业劳动岗位不存在了。法国在这20多年减少的工业劳动岗位差不多与从1890—1968年创造的工业岗位一样多。工业劳动阶级似乎已经衰弱并部分被主要由女性构成的后工业无产阶级所取代,鉴于这一阶级所处环境的不稳定性和所担负工作的性质,是不可能从其劳动中衍生出可承受起

^① [美] 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页。

经济的、技术的和政治权力的那种社会地位和使命的。^①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西欧社会阶级状况的描述反映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的新变化，这一变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成挑战。左派究竟应该如何做？如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呢？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生态社会主义者努力探求对新的社会形势下的社会矛盾的新认识，以寻求一条不同于马克思的人的解放道路。如高兹把左派、社会主义者的奋斗目标定位为不仅使产业工人而且使所有的人都获得自我实现，不仅仅使劳动者的劳动而且使劳动者的非劳动活动都成为一种自主的创造性活动。用一句话概括，即实现所有的人的所有活动的自主化。这一总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左派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修正，放弃了工人阶级的历史变革作用。但工人阶级的变化并不能说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已经过时，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减少了，但随着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世界上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工人阶级的分化也不能说明他们没有共同利益，而只能说明必须以新的组织和协调形式，将共同利益转化为具体行动，并形成政治力量。

伴随西方工人阶级的这种新变化，社会主义实践运动也出现了困境。东欧与苏联政权的崩溃，使很多人对社会主义丧失了信心。1989—1991年，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74年之后突然瓦解，世界社会主义遭到史无前例的大挫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红旗落地”的现实，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迷茫和困惑之中。各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关注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学者对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得失、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等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和积极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把苏联的社会现实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进行比较，批判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及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发展模式。认为苏联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而是独裁主义国家、异化社会。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历

^① Andre Gorze,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Ecology*. Translated by Chris Turner, London: Verso, p. 32, 1994.

史性失败，是社会主义运动遭遇困境的第二个原因。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工运动，曾经在巨大的群众动员与斗争中从资产阶级那儿取得重大胜利。最重要例子包括把每周工时逐步从 72 小时减到 38 小时，取得普选权，为工人设立各种保护制度使其免受过度剥削。由此观之，我们应当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成果感到骄傲。但所有这些改良的总和未曾导致社会发生本质改变，没有一个地方因此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基本性质。所有这些改良都没有超越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性质，意味着它们无法防止周期性经济危机、周期性的大量失业及广泛贫穷，以至于周期性限制或废除民主自由与人权，还有周期性的战争或其他困难。在很多人眼中，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两大历史性运动，即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都不尽如人意。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工会的衰落、传统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淡出，欧洲社会主义政党面临重大挑战。新左派认为，在目前阶级力量对比中，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受到怀疑，左翼力量相对弱小，因此有必要采取新的联盟战略。左翼不能再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人阶级运动尤其是有组织的工会运动上，而应当从组织、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扩大自己同盟者的范围。潜在的同盟者包括生态运动、和平运动、人权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同性恋运动之类的迄今为止仍受社会歧视的运动。新的左翼联盟将像彩虹一样有多种意识形态色彩，但它的核心组织原则是民主、社会主义取向（从长期而不是直接的意义上讲）、反对帝国主义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简言之，从左翼社会主义运动角度，社会主义政党需要从以绿色生态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中汲取新的动力。

著名的左翼理论家、生态社会主义者安德烈·高兹从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社会主义的危机与前途和新左派的历史使命的战略高度，提出了“红绿联盟”的必要性。他指出，第一，传统社会主义陷入危机。当代科技革命即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社会后果，是传统社会主义运动的衰落和无产阶级的消亡。第二，社会主义没有过时。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不能说就是资本主义的胜利。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是互相矛盾的。为了解决二者冲突，必须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具有

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方向，它限制利润和市场的逻辑，凸显了社会主义事业至今对我们仍然具有的清晰意义。第三，社会主义必须与新社会运动结盟。如果社会主义要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一百年前社会主义的起源，组成反叛资本主义的联盟，进行激进的社会批判。社会主义左派要在组织上把宽容态度贯彻到底，坚持与新社会运动的主流——生态运动结盟，建立一种新左派，即 30 年代反法西斯人民阵线那样的联盟，共同反对晚期资本主义，为解决当代全球问题指明行动方向。高兹的看法虽然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但他关于传统社会主义运动已消亡的定论太过武断，他所说的生态社会主义也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

三 西方生态运动与绿色政治的兴起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环境公害事件的不断发生，生态问题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为了寻求良好的环境与健康的生活，西方发达国家的广大群众自发掀起声势浩大的环境运动。千百万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治理和控制环境污染，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为环境和健康而呼吁，很多社会团体把生态保护列为宗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地球日”活动与环境正义活动。

“地球日”活动。1969 年 4 月 22 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盖洛德·尼尔森提议在校园举办有关环境问题的讲习会。哈佛大学学生领袖丹尼森·海斯提出把尼尔森的建议变成全美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社区性活动的构想，并提议次年 4 月 22 日作为“地球日”，在全美开展环境保护活动。该提议很快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响应。1970 年 4 月 22 日，“地球日”活动首次举行。美国各地有 2000 万多人参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运动，仅在纽约市区，就有几十万人上街游行。“地球日”活动正式开启了生态保护运动。

环境正义运动。又称为反对环境种族主义的运动，即反对将污染转移到落后地区、种族和国家的运动。1982 年，在有色人种和低收入人群聚居的美国瓦伦县，居民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阻止美国政府将该地区作为有毒垃圾掩埋场所。这次运动提出了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社会不公正现象，证明污染公害不是被解决，而是被转移到有色人种和